

# 白先勇

白先勇文集

第一卷

短篇小说

1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寂寞的十七岁

# 白先勇文集

第一卷  
短篇小说



寂八十七岁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白先勇文集①

寂寞的十七岁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寂寞的十七岁 / 白先勇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白先勇文集; 1)

ISBN 978-7-5360-5515-5

I. 寂… II. 白…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3718号

策划编辑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题字 苏 华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7 4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白雲山

# 自序

白先勇

广东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白先勇文集》是迄今为止搜集我的作品最完整的一部集子，各种文类都收齐了。

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谈，统统有，可以说相当全面的呈现了我这些年的文学活动。比较特殊的是，这个集子也收入了两本分析评论我作品的著作：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以及刘俊的《悲悯情怀》。

欧阳子是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当年我们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这本杂志持续出刊达二十多年，我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发表于《现文》，而我又常常与欧阳子讨论文学创作的问题，因此，她对我写小说的心路历程可谓了如指掌，在七十年代中期欧阳子终于写下了《王谢堂前的燕子》这部评论《台北人》的精心杰作。欧阳子自称这是一本《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事实上，这是欧阳子全面深入探讨《台北人》主旨涵义及小说艺术的一部论述巨著。欧阳子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家，深谙小说创作原理，在这本论著中，她采用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影响至巨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方法，扣紧文本，由微观入手，从字里行间，解读出小说背后历史文化的宏观意义，《台北人》一共由十四篇短篇组成，欧阳子每篇都从不同的观点切入，层层剖析，将埋伏在小说写实架构最底层的象征内涵，挖掘出来。大陆美学评论家余秋雨教授在一篇论《台北人》的文章中曾如此称赞欧阳子



这部书：“用心之细，联想之妙，让人叹为观止”。我也有同感。犹记当年，每读到一篇欧阳子评析《台北人》的这一系列论文时，就不禁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她能洞悉作者朦胧幽微，下意识中的创作动机明察秋毫，一一剖解，而又能解说得如此精微周到。叹服之余，我亦不禁庆幸，《台北人》终于有了解人，觅得知音。

《悲悯情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俊撰写的一本“白先勇评传”，我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但我的作品却都在海外台湾美国完成，时空的阻隔，大陆的读者与批评家对我作品的反应，令我十分好奇与关注。刘俊教授这本《悲悯情怀》让我看到了大陆学者对海外台湾作家异中有同的特殊视野。刘俊教授这部著作作用功甚深，立论精辟，而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我很高兴，刘俊教授允许将《悲悯情怀》收在文集中，对我的小说创作的阅读，起了导航的作用。

这部文集，是由中山大学王晋民教授主编的，王晋民教授是第一位将我的作品引介给大陆读者的“功臣”。我非常感谢他替这部文集撰写的长序。执行编辑詹秀敏女士也为这部集子花费了惊人的心血，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她。

2000年1月31日

# 再版几句话

白先勇

花城出版社这套书迄今都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中最完整的一套文集。因主编者詹秀敏等人的精心策划，这套文集编排印制美观讲究，很受读者欢迎。如今这套文集即将再版，我自然感到高兴，也希望新的读者们喜欢这些装制精美的书。在此，再一次感谢花城的编辑们为这套书付出的心血与辛劳。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日

# 序 一

欧阳子

一般的作家，或因经验不足，或因文才有限，即使在文坛上成功成名，他们毕生所能写出的好作品，常常只是同一类，同一色调的。因此，对一般作家，我们常常可以轻易而明白地分类，说他们是“写实派”、“超写实派”、“心理派”、“社会派”、“新派”、“旧派”……

但是，我们却无法将白先勇的作品，纳入任何一个单一的派别里。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

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表白的《香港——一九六〇》，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

白先勇小说里的文字，很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白话，恐怕中国作家没有两三个能和他比的。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〇》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借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香港——一九六〇》里的文字，立刻传给我们一种混淆杂乱的感觉，使



我们体会到香港这一小岛的可怕的混乱与堕落。《安乐乡的一日》里，在寥寥几行描写安乐乡景色的一段（小说第四段），作者用了三个“死”字（死角、死水、死寂），两个“灰”字（淡灰色、灰茫茫），此外还采用“枯竭”、“滞住”、“静寂”、“没有中断”、“没有变化”等词句，来象征女主角依萍内心的沉滞与隔世感。而作者使这故事发生在名叫“安乐乡”的地点，当然不无讽刺的效果（ironical effect）。

读者看白先勇的小说，必定立刻被他的人物吸引住。他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教育程度之高低，个个真切，个个栩栩如生。我们觉得能够听见他们，看见他们。白先勇的小说，几乎全以人物为中心，故事总是跟着人物跑的（只有《香港——一九六〇》是例外。在这篇里，真正的主角不是余丽卿，不是她吸鸦片烟的情夫，而是香港这个小岛）。身为一个男人，白先勇对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了解。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

从这本选集里，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写作技巧方面，一直在进步着。他较早的作品，像《玉卿嫂》和《寂寞的十七岁》，虽然人物如生，故事动人，但结构方面，似较松散；有些细节，虽能使故事更显丰润，却未见得与小说的主题有切要关系。就好像作者有太多话要说，有点控制不了自己似的。但他近来的作品，好像过滤出来锻炼出来一般，结构异常紧密；没有一个细节，甚至于没有一句话，是可以随便删略的。每一篇，都像一张密织的网，那样完整。若是从故事里删去任何一个插曲枝节，就可能像剪断网之一线，伤害了全体。

特别是在近作中，白先勇总是以故事里人物的动作，或该人物与他人之对话，来明示或暗示该角色的心理状态；而不直接告诉读者，该角色感觉这样，感觉那样。譬如在《一把青》里，作者要表达朱青经过战乱丧夫的惨变后，由于心死而变得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但他不直接这样告诉我们，却采用朱青对两次事变（郭轸与小顾之飞行失事）不同的反应，做个强烈的对比，以衬托出朱青的改变与麻木。这种写作技巧，若以主角为第一人称来写，就很难于运用。因此，除了《寂寞的十七岁》外，白先勇的小说，若非用第三人称下笔，便是取一个次要角色，为第一人称，从旁观的角度写成的。这使得作者与主角之间保持距离，因而易于保持客观。

白先勇的小说中，剧景的转换与上下文的连接，非常畅顺自然。这在他的传统叙述中，固然如此；在他运用“意识流”时，更是如此。《游园惊梦》里，钱夫人眼看程参谋和蒋碧月两人在一起，她的思想在瞬间逆流，回溯到过去的一幕类似的情景。于是，“现在”与“过去”流为一体，纠缠不清。但正当她再一度经验着过去那段痛苦的往事：

“五阿姐，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站了起来，走到钱夫人面前……

（《游园惊梦》）

以上是白先勇善于连接上下文的一个好例子。蒋碧月说这句话，别无他意，只是叫钱夫人上场唱《惊梦》这一段戏。但这句话紧跟在钱夫人的回想冥思之后，就明显地产生了双重作用。

白先勇的小说，虽然以人物为中心，但他小说中的“主题”（theme），并不比人物次要。在他最近几篇里，主题甚至压在人物之上，人物像是被作者特地选出来表现主题的。在白先勇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有下列几个：

一、由于逃避“现实”，由于缺乏勇气、力量去面对与接受它，或由于只肯后顾，不肯前瞻，许多人便在不自觉间与世脱节，觉得自己一无所属，终于成为一个失败者。白先勇对这一类人物充满同情，似乎不愿归罪他们，而归罪于我们这残酷的，过分讲究“理性”的世界。《我们看菊花去》里的姐姐，《寂寞的十七岁》中的主角，《安乐乡的一日》之依萍，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二、人性之中，有一种毁灭自己的趋向，这趋向是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直把人往下拖，拖向失败、堕落或灭亡。像玉卿嫂，《香港——一九六〇》的余丽卿，《那晚的月光》中的李飞云，《谪仙记》里的李彤，都是因为敌不过自己，才走向败亡之途。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过去，可是如今，这种大气派的中国文化，竟已没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我们缅怀过去，不胜今昔之感。辉煌的往日，已是一去不返；我们除了默默凭吊，默默哀悼，又能怎样？

这最后一个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在白先勇的最近几篇小说中出现。尹雪艳、朱青和钱夫人，都可说多多少少象征着中国与传统文化的解体：尹雪艳是吗啡样的麻醉剂，暂时使人止痛，忘忧，但终于把人引向死地。朱青受战乱之害，历经折磨，终致失去灵性，麻木不仁。钱夫人有过辉煌过去，但只因为“长错一根骨头”，她开始走下坡路，终于变成空壳一个，与世脱节。而《谪仙记》（请注意“谪仙”二字的象征意味）里的李彤，绰号叫做“中国”，用意更是明显。这几篇小说的语气（tone）中，有一种怀古念旧的余韵。

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各种写作技巧，使得他的作品精练，现代化；然而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

国故事。他写作极端客观，不在他作品里表白自己的意见。可是读他最近几篇小说，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我们感觉得出，他也像《谪仙记》里的慧芬那样，为着失落了的中国（李彤），心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

## 序 二

王晋民

### 将传统融入现代的白先勇

白先勇是台湾较有影响的当代作家。1937年出生于家乡广西南宁，父亲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之后，他曾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居住。1948年到香港念小学，1952年到台湾上中学，1957年入台大外文系，毕业后，于1963年进美国爱荷华大学小说创作班，并于1965年获硕士学位。随后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语言文学课程。

为了对白先勇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作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作者的生平中，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作者从小就喜爱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作品。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说唐》、《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巴金的《家》、《春》、《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都是他所喜爱熟读的作品。他对小时候爱听民间故事有一段很生动的描绘。他说：“讲到我的小说的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跟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的第一本小说，而那银

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穿银灰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蓦然回首》）对于中国的古典小说，小时候的作者更是着迷。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徐讦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蓦然回首》）在大学时代，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白先勇开始阅读和介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在创作上也开始模仿西方文学。但是毕业后入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时，作者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作者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写道：“在那段期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寻。像多数留学生，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的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的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我便狼吞虎咽起来。”对中国民间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使他具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这就是为什么白先勇长期生活在台湾和美国，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却仍能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原因。

二、白先勇从小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对祖国和民族有较深厚的感情。作者少年时代曾在天府之国的重庆生活，当他回忆起幼年时见到的巴山蜀水时，至今还非常神往。高中毕业时，由于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白先勇放弃了保送台大的有利条件，入了台湾水利学院。后因发现自己对水利没有兴趣，才转入台大外文系。他对祖国大陆的印象极其深刻，非常怀念。1967年，白先勇回台湾探亲，《幼狮文艺》的林怀民问他大陆时代的事可还记得，他回答说：“怎么不记得？清楚得不得了；北平、上海、南京——好多地方，长江啊，黄河啊——那些山啊水啊，拉船的夫子……好清楚好清楚。特别是出国了，这些记忆变得愈来愈清晰。好奇怪的——对，也许我想得太厉害了，不由自主地用想像来夸那些记忆吧。不过，台

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林怀民：《白先勇回家》）白先勇所日夜思念的所谓总合性的“家”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正是这种对民族和祖国的深沉感情，使这位远离祖国的游子在作品中散发出淡淡的“乡愁”。

三、白先勇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生活条件比一般人优越，但他从小对他所接触到的下层劳动者，却颇为同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曾谈到他对家里的厨子老央的态度：“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他曾谈到童年时代的这样一件事情：嘉陵江涨大水，他拿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滔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水淹没。他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他因病在床上不能下来，便急得捶着床叫：“哎！哎！”后来，作者在《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充满同情地描写出了娟娟、朱凤、王雄这一类下层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悲惨命运，当然就不是偶然的。

四、他对自己的家庭身世感慨颇多。据作者自己说，1963年出国的前夕，母亲去世，等到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灵震撼较大。作者曾写道：“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这些思想情绪都是相当感伤的，后来作者写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中的吴汉魂、李彤等一个个投水自杀，大概与作者这一时期的悲凉心境不无关系。

白先勇于50年代末开始从事创作活动。从1958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到1979年8月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发表《夜曲》为止，共发表了30多个短篇小说。1960年，他在台湾与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先在这个杂志发表，然后陆续汇编成《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谪仙记》等几个短篇小说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从1977年开始在《现代文学》上连载，后来由台湾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早期作品，主要是描写作者少年时代所接触的



活，或模拟西洋文学的作品，如《寂寞的十七岁》中的大部分作品；二是描写台湾上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如《台北人》；三是描写旅美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如《纽约客》；四是描写台湾下层人物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孽子》。

白先勇的小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一般以1964年在美国发表的《芝加哥之死》为界线，在这篇小说之前所有在台湾写的小说称为前期作品，在这以后所有在美国写的小说称为后期作品。前期作品，受西方文学影响较重，较多个人色彩和幻想成分，思想上和艺术上尚未成熟；后期作品，继承中国民族文学传统较多，将传统融入现代，作品的现实性和历史感较强，艺术上也日臻成熟。

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中现实主义精神较强的作家。他曾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等几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这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台湾后，又目睹了国民党旧官僚的没落，以及许多离乡背井、流落台湾的下层人民的痛苦挣扎，他们的思乡和怀旧情绪，都影响着作者；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着和漂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涌入他的心胸。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实的反映。

## 白先勇的文学观

白先勇对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了解白先勇的文学观不仅对研究分析他的作品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提高我国的文学创作水平，也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白先勇的文学观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文学作品的社会意识与艺术价值要平衡，思想内容与技巧形式须互相协调。白先勇认为，文学作品的社会意识和艺术价值必须平衡，只重视社会意识而忽略艺术价值，或只重视艺术价值而忽视思想内容，都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他说：一篇小说中的社会意识与艺术价值并不必要互相冲突，彼此不容。而且如果作品中的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取得平衡，内容与技巧互相协调，作品的社会意义便更能反映时代精神（见《明星咖啡馆》17页）。“五四”以来以社会写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小说，凡是成功的作品，都是社会意识与艺术表现之间，得到一种协调平衡的产品。换言之，也就是小

说内容主题与小说技巧合而为一的作品。如果小说只顾表现强烈的社会意识，而忽略其表现艺术，这一类作品，我们今天看来，往往感到过时，不耐读。因为社会问题，为时空所限，社会问题的本身不存在后，如果没有艺术价值在支撑，那么小说对读者常常会失去吸引力（见《明星咖啡馆》22页）。

又说：当然内容决定技巧，但技巧决定故事的成败。故事的成败第一要看技巧，是不是以有效的技巧表现它的主题，然后再欣赏里面的意义和主题。有时不能一分为二，两者合起来，技巧本身就是主题（见《蓦然回首》139页）。我个人认为小说是 art，是种艺术，绝对需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是比较靠得住的，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但也不是为技巧而技巧，我想没有伟大的作家会为了表现某种技巧、形式来写小说，一定是先有了题材，才找最合适的文学形式来表现它的内容，愈深奥的题材所需的技巧愈高，像《红楼梦》（见《蓦然回首》121页）。

根据社会意识和艺术价值，内容与技巧必须平衡发展的观点，白先勇认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小说家当推鲁迅。

他说：我们研究“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会发觉成功、优秀的作品都是在社会意识及小说艺术之间取得了平衡协调的成果。“五四”以来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当然首推鲁迅。鲁迅的重要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对中国旧社会封建传统的黑暗面尖锐的批判揭发，他这种道德觉醒与道德的勇气，替“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典范；另一方面是他第一次将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形式，成功地引进他的创作中而开创了中国小说，尤其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新风格。鲁迅生于新旧交替之间，本身的性格又异常复杂，矛盾重重。他的杂文，往往表现出嫉恶如仇的一面，有时不免流于偏激尖刻，但他在《彷徨》、《呐喊》两部小说创作中，那种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却受到相当的艺术上的节制。这两部小说集的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风格是最大的特色，亦是其艺术成就的重要因素。

二、文学不仅要反映时代，而且要表现永恒的人性和各种社会哲学思想。白先勇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社会与时代，第二层次是超越时代的永恒的人性，第三层次是隐藏在社会写实背后的一种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

他说：我认为一部好作品之所以了不得的话，是因为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意义产生，这样才会长存下去。伟大的作品一定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它的超时代性（见《明星咖啡馆》）。小说光反映时代意识、社会意识，这个很危险。我们看世界伟大的文学，它们有些不见得是反映当时社会意义的，像曹雪芹是写他童年时代的回忆，与他当时无关，托尔斯泰的《战

争与和平》是写拿破仑侵俄，他也不是拿破仑时代的人物，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都不是写英国发生的事情。我想文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表现了永恒的人性（见《蓦然回首》124页）。像《诗经》之所以能传到今天，因为写的是永恒的人性，这个比时代意义更重要。基本人性不变，文学、题材最重要的还是表现人，也许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以不同的方式去表现……感情人人都有，人的感情也是相通，就看你如何表现。题材嘛，从古到今，实在很有限，生老病死，战争爱情，八个字，讲人事嘛，太阳底下无新事，没有与以前不同的事（见《蓦然回首》138页）。

在谈到文学要表现永恒的人性时，白先勇进一步提出要表现社会人生和人性的多面性。他说：伟大文学之所以可贵是把人生复杂面，面面观，能够透视；愈伟大的文学愈复杂，面愈多。社会人生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黑白二分法，一定不能用二分法，一定有好处和坏处，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见《蓦然回首》124页）。我看曹雪芹之所以伟大，他看人不是单面的，不是一度空间，他写凤姐的刻薄，还有很多地方，但我觉得曹雪芹了不得，他对这么凶、这么心狠手辣的女人，她极人性的一面，也顾全得到。因为人不可能完全坏的，而且凤姐，讲起来，整个来说也不算是完全百分之百丧失道德能力的人，你看她临死时对女儿的那种母爱，我觉得是很动人的一幕，是贤妻良母的话，写他人临死对女儿的关切，不会怎么动人，但像凤姐这样的人物，到死的时候如此凄凉，尤见曹雪芹悲天悯人之心。凤姐之死非常动人，我认为他写得极精彩之一幕。凤姐临死的时候，刘姥姥出场，多大的讽刺。过去她对刘姥姥爱理不理，最后是她求刘姥姥。《红楼梦》里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同上）。

白先勇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要表现时代和永恒的人性，而且要表现深刻的哲学思想，才能使作品具有深度。他说：小说表现人生理想、宗教的或哲学的，或是社会科学的，种种比较深奥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些在背后，完全是社会写实，这类小说的社会意义比较有限。拿两本小说来比较一下，《红楼梦》与《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没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技巧再好的话，表现科举制度，但现在没有科举制度啦，我们就不觉得那本书永恒的价值有多大。《红楼梦》不一样，表现了永恒的人生问题，所以比《儒林外史》高。《儒林外史》的角色，只止于本身，不能扩大为全人类的共相，贾宝玉就不一样。《红楼梦》的主题非常大，把我们的基本哲学、儒家、佛家、道家统统表现出来了（见《蓦然回首》138页和148页）。

三、要继承我国民族文学的传统，特别是我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